

“中国向何处去?”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的相互解读

童世骏

【摘要】在现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探索 and 创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大概是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在近代以来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论著中,罗素出版于1922年的《中国问题》大概也是最著名的文本之一。对这两本书作相互解读,有助于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刻,从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之分、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之争和文化参与者与文化观察者之别等角度,重温甚至重启这两个文本都讨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进一步对“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的问题,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回答。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文化;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文化的参与者视角与文化的观察者视角

【作者简介】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原文出处】《哲学分析》(沪),2023.3.16~35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出版于1922年年中,那时距这位英国哲学家结束其为期九个月(1919年10月至1920年7月)的中国之行,还不到一年。哲学家梁漱溟(1893-1988)在1972年国庆前夕特地写文章,赞扬这位“英国哲人”在半个世纪前对“我国的光明前途”有不凡预见。^①

毛泽东(1893-1976)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年初;它先是在延安的一个演讲,后刊于延安的一家杂志。哲学家冯契(1915-1995)在1994年谈到其思想历程时说,“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前者回答了“抗战向何处去”的问题,后者则“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②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这两部作品发表时间相隔近20年,作者身份更有巨大差别,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相互解读,这种相互解读会带来哪些独特收获,这是本文下面要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之间的相互解读,如何论证?

对罗素《中国问题》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相互解读,至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两本书都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共有十五节,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③而罗素的《中国问题》共有十五章,第十五章的标题是“中国前景展望”。^④

第二个理由,两本书不仅都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都把“中国向何处去”当作“世界向何处去”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论》专门有一节讨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正文里,作者觉得在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之下,仅仅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还不够,还应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⑤同样,《中国问题》在第一段就说:“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

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⑥

第三个理由,是两本书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重点讨论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先是毛泽东应延安一个文化团体之邀做的演讲,后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它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时,重点讨论了文化问题,以及文化与经济及政治的关系问题。同样,《中国问题》也认为中国问题核心是文化问题:“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中国问题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⑦

以上说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相互诠释的可能性。但两本书之间的相互诠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的论述,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做了间接回应;尤其是,他以后几次重要讲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的论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罗素对中国未来做的预测:“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⑧第二是罗素对中国未来表达的担忧:“在壮大国力、维护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足够强大,以强自恃,走上帝国主义道路。”^⑨第三是罗素对中国未来的期望:“如果中国志于改革的人守中道、有节制,在有防御能力时就罢手不为,戒除征伐欲望,不去侵略外邦;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不去做强国硬塞给他们、一心只想满足物欲的活动,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⑩

似乎是回应罗素的上述论述,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

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⑪

在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表达同样的意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反对大国主义,这更适合与罗素在34年前的中国论述放在一起理解。

首先是在1956年9月15日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⑫

然后是在1956年9月24日接待出席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篇幅不短的主题为“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讲话。毛泽东对南斯拉夫的同志说,有人在宣传:“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⑬针对这种说法,毛泽东说:“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⑭在讲了一长段我们在国际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反对大汉族主义以后,毛泽东说:“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⑮毛泽东甚至更加坦率地说,“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⑯为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同志说:“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⑰

最后是在1956年11月12日,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

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⑧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⑨

相隔几十年的中外人物的言论中有相同话题,甚至有相同观点,这样例子可以找到许多。但把毛泽东和罗素两人的相隔几十年的言论放在一起理解,是有特殊理由的,那就是:毛泽东年轻时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罗素相关观点的回应。罗素到中国以后,先在南方几个地方做了旅行;1920年10月26日下午和晚上、27日上午和下午,他应长沙教育学会之邀在长沙就“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连续做了4个演讲。当时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做记录写报道的毛泽东听了罗素的讲演一个多月后,写信给他的新民学会友蔡和森和肖子升等,说“罗素在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泽东说,于罗素讲演后,他曾与另外两位新民学会会友“有极详细之辩论”,他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⑩

毛泽东与罗素的缘分不限于长沙演讲。罗素到了北京,在北大讲数理逻辑、心的分析等,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去听过。^⑪后来,在延安时期,据当时到访的国际友人回忆,毛泽东的藏书中有罗素的著作。^⑫新中国成立后,在1957年9月18日晚上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时,毛泽东提到罗素,说“我知道罗素,听过他的讲学。罗素曾经到过我的家乡长沙。他很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但是他怕中国的手工业像英国的一样,维持不久。其实,手工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迟早是要让位给机械化工业的”^⑬。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形式逻辑时,又提到罗素,赞扬罗素政治上有进

步,并提到罗素送了他一本书,说这本书可以翻译出来看看。^⑭另据张申府回忆,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11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到中国来讲学了”。但张申府说,“可能由于罗素先生年事已高,此次讲学,未能成行”。^⑮

二、文化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如何认识?

对罗素的《中国问题》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相互解读的主要角度,是两书对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所做的论述;这种相互解读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让我们从“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这两个范畴的关系出发,对文化的性质和作用有更好认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文化依赖于经济以及政治,另一方面认为文化有相对独立性,给经济与政治以反作用。虽然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的作用是“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但毛泽东在该书中对文化的阐述,却比该书中对经济和政治的阐述,有更长的生命力。一方面,他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概念,至今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之官方界定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之一^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用冯契的话来说,是从哲学高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也“使近代哲学达到总结阶段”。^⑰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开始就强调文化问题的普遍重要性;在他看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三类密切相关的问题中,文化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罗素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的最佳认识途径,是不同文化的比较:“在对比异域外邦文化与本国文化时,人们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比国内通常出现的问题更具根本性意义。人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评判某种类型的社会优于别的类型时,所依据的是什么?哪些目标是我在全世界实现的?”^⑱

在罗素看来,“看重”或“认为有价值”,有两类对

象,一类具有内在价值,一类只具有工具价值:“在我看来,有几样东西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这几样东西是: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就知识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干巴巴、毫无生趣的事实,仅仅有些效用。还有一些知识不能产生任何重要价值。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是从科学中得到,且有失全面,我还是认为其自有益处和趣处。一些传记文学、一部分历史也是这样。……我认为艺术是自有其重要价值的事物之一。”^②在罗素看来,文化之所以与经济和政治相比较更重要,是因为文化涉及的是内在价值(“自有重要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

同样是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罗素明确强调那是因为文化——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是目的,而经济和政治是手段:“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一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③而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却主要因为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④;“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⑤;“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⑥。当毛泽东做这些论述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主要是文化的工具价值。

文化当然是有工具价值的,是为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就连罗素,他在《中国问题》中不仅把经济和政治当作服务于文化之目的的手段,而且也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会发生的实际影响。罗素之所以不仅对中国富强的前景抱有殷切期望,而且对中国富强的后果抱持深重疑虑,就是因为他看到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罗素知道,物质财富创造能力极强的工业文明,既要求相应的文化条件,也产生相应的文化后果;而罗素深恶痛绝的欧洲逐利倾向、竞争心态和控制欲望,既是西方人的“推崇冲突、开发、不停变化、不知满足以及破坏”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也是这种生活方

式的原因:“我们的工商文明既是我们多少是不自觉地形成的有关何者有价值的信念的原因,也是这些信念的结果。”^⑦

但毕竟,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其首要功能是决定人们对生活意义、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肯定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有工具价值的同时,很有必要把文化主要作为内在价值来对待,承认文化“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⑧。其实,这样的观点毛泽东也是有的,尽管没有强调;当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⑨的时候,当他还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⑩的时候,他也是把和平、自由、勇敢、勤劳、文明和幸福,当作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来看待的,但他在阐述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工具主义的文化观,或工具主义的元价值观——对价值只承认其工具价值而不承认其内在价值的观点,很容易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甚至价值虚无主义。因为,具有工具价值的东西,是可变的、可替换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和平、自由、勇敢、勤劳、文明和幸福这些价值,是无法被别的价值替换的;但某个特定的规则、机构、程序、策略或战术等等,则通常是可以被替换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是要我们以敬畏态度来对待的。近年来,“敬畏”一词常常听到。以前不大听到这个词是有问题的,但现在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把“敬畏”这样的词也用于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东西,真正值得用敬畏态度对待的,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所说的,“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⑪,就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敬畏。

从实践上说,重视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重视文化的工具价值,对于已经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引用《老子》中“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一语来说明中国人的人生观,但同时他说,虽然老子想让我们摈弃的三种东西之一是“有”,但一般中国人实际上却是很重“有”的。^⑨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直到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无”或贫困、匮乏甚至一无所有,是“一般中国人”的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了今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⑩;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⑪就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更是一个实践目标;在“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格局中,文化建设的目标理应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三、文化观上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如何选择?

把《中国问题》和《新民主主义论》做相互解读,还可以让我们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种观点的对比出发,对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有更好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观容易做工具主义的理解的话,罗素的《中国问题》中的文化观,则容易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即把“某某文化”这个词对应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当罗素说“中国人应该寻求独立,但独立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西方技能与中国传统美德新融合的一种手段”^⑫的时候,当他说“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判。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⑬的时候,他的观点是很容易被理解为接近“中体西用论”,或“中国本位文化论”的^⑭。这种观点不仅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本末”关系中的“本”,而且把“本”本身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中国传统”或“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能否存活取决于现代中国人是否愿意选择它、是否能够保存它,但它的内容,在罗素看来却是为中国所独有、越古今而不变的。^⑮

前面说过,罗素是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与该民族的经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的,但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

这种关系做“能动的革命的”理解,没有把这种关系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⑯相联系,更没有运用“心物”(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知行”(理论与实践)和“群己”(社会与个人)等一系列打通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哲学范畴,来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互动理解为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创造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文化、经济和政治都有新旧之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目标的具体途径,是“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⑰,是在这种奋斗当中有意识地造成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之间的相互推进。毛泽东心目中的“现时的中国新文化”^⑱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处理中外关系的结果,而且是处理古今关系的结果,以及雅俗关系(或精英和大众的关系)的结果;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著名结论。^⑲

毛泽东这种对中国文化做新旧之分、并把新文化看作是一个自觉建构的目标的观点,可称作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把“某某文化”不是看作与这个词相对应的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是相关人群的创造、反思和学习的产物。可能正是因为受静态的、消极的本质主义文化观的影响,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虽然期望中国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⑳,但同时也担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国人受到残暴权力的诱惑,迷失了方向,他们可能会在表面上赶走了敌人,但在内心却败给了敌人。”^㉑罗素在后来回忆其中国之行时甚至更悲观地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㉒

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把以不同形式与罗素和毛泽东都有深层次思想交流的梁漱溟的工作,作为《中国问题》和《新民主主义论》之间相关解读的一个辅助文本。从1921年写文章表达“对罗素之不满”^㉓,到1972年国庆前夕撰文夸罗素对中国发展有

“先见之明”^⑤，梁漱溟一直对罗素的工作相当重视。同时，从抗战时期以“国防参议员”身份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长谈多次，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恺说“最伟大的中国人……恐怕还是毛泽东”^⑥，梁漱溟的毕生思考也与毛泽东有密切关联。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再三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中全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⑧，以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⑨，这三件事情的时间先后，很可能并非完全偶然。

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反对工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在这方面他明确地引罗素为同道。他在1925年给十几位青年讲“孔家思想史”时说：“天下最危险的事，就是怕人没有生趣。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生趣，便要闹大乱子，社会就要掀动。让人丧失生趣的就是算账，就是功利的态度。”^⑩梁漱溟说：“除孔子以外，所有古今中外，一切的哲学家，大都是功利派。我说将来世界必走入孔家的路子上。换言之，即是非功利派将代功利派而兴也。”^⑪梁漱溟说，正当他年轻时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看到罗素的意思，几乎令我大喜如狂”。^⑫他说罗素虽然引用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几句话来表达他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其实是“与孔子有同样的旨趣”：“他的旨趣只是自由生长一句话，而孔家要旨也只在不得生机。”^⑬在抗战后期写的一篇文章中，梁漱溟在回答“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的问题时回答说，中国人能贡献给世界的首先是中国人的“人生向上”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欲之争”之“理”，“义利之辨”之“义”^⑭，就是古语所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⑮。梁漱溟最后引用罗素“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概念(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一语，说“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者，就是这点东西”。^⑯

梁漱溟虽然在中国文化之特点和中国文化之优

点的理解上引罗素为域外同道，但在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建国”过程中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却与罗素看法不同。简单地说，罗素重视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在中国自强过程中的“可欲性”，而梁漱溟重视中国文化，则因为中国文化在中国自强过程中有“可行性”，强调它有助于解决自强过程的实际问题。在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中梁漱溟列举了五十年来文化建设上中国所持的几种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方化”；“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说他在1920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被认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对此他说：“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辨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⑰。梁漱溟之所以觉得“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不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文化不值得作为“本位”；相反，他在那篇文章中一口气列了七点，表明“中国民族所成就的，真乃自古人类唯一奇迹。它之相形见绌，只是最近一百余年的事而已”。^⑱所谓“相形见绌”，就是中国，连同其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危机；为了走出这种危机，离不开文化作为手段；而既然把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就不能“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渺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⑲梁漱溟不仅像罗素一样肯定中国文化的可欲性，而且比罗素对这种文化用于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可行性有更强信心；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这种更强信心的一大依据，恰恰是罗素这样的西方人的态度，即他们也开始“要求开辟一条较合理的人生道路”了^⑳；对梁漱溟来说，罗素印证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16-1920)中描绘的一次大战暴露的西方危机，也强化了他的这个观点：中国文化“一面是给数千年古文化在近百年遭遇西洋所引起之大转变，作一结局；同时，一面亦是给世界未来文化开前途。因为近代西洋文化所领导的世界，走到今天，明明已临于转变前夕”。^㉑

但是，实际上，罗素能代表的至多是近代西方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方面，所以罗素在访华告别演讲中

也肯定的苏俄道路^①,其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或价值目标,后来更多地被梁漱溟用来证明,他所追求的那个以“理”取代“力”和“利”的趋势,是有事实依据的。^②当然,当梁漱溟把他所说的中国人的“理性精神”与社会主义理想对应起来^③的时候,罗素曾经推荐过、而梁漱溟自己直到新中国后才努力认同的苏联,已经在他写《中国——理性之国》时(1970年)被作为“苏修”而与“美帝”并列了^④;但尽管如此,梁漱溟从“理性精神”对世界的意义,而不仅仅对中国的意义,来理解他心目中以这种“理性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方法论上是与《中国问题》和《新民主主义论》都一样的。而当梁漱溟说“质言之,‘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⑤的时候,梁漱溟的态度则更接近于《新民主主义论》的作者的,可列入建构主义文化观的范畴。

四、考察中国文化的参与者视角和观察者视角,如何整合?

借助于梁漱溟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相互解读,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这两本书作者之间的一个更重要区别:中国文化之参与者与中国文化之观察者的视角区别。

梁漱溟在前面提到的写于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主张^⑥,但早在1922年春的一个演讲中,他就注意到“《东方杂志》译罗素《中国国民性的几特点》,说中国人不好一面的特点顶头一件就是贪婪”^⑦。梁漱溟不愿意承认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毛病,说“这种情形似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现有的”^⑧。梁漱溟的这段话,与罗素相比,跟中国本位文化论相距并不更远。但在1922年说这段话之前,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看上去就已经很明白,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实际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区别不小的:“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治天下,实际上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气。本来孔家道家其最后根本皆在易理,不过孔家则讲《周易》,道家则远本《归藏》,都是相仿佛的一套形而上学。其所差似只在一个阴柔为坤静之道,一个阳刚为乾动之道;而中国人总是偏阴这一面

的。”^⑨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化”无论是作为文化诠释的产物,还是作为文化变迁的产物,在梁漱溟那里说到底都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梁漱溟实际上像罗素甚至像毛泽东一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新旧之分,而旧文化到新文化的变化,离不开文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离不开文化主体对原有文化之各种因素的评判取舍,也离不开文化主体对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对其做改造和更新。

但是,谈到文化的评判取舍和改造更新,毛泽东、梁漱溟、罗素三人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必须重视,那就是文化的参与者和文化的观察者之间的视角区别。

笼统地说,任何人都同时是文化的观察者,也是文化的参与者。但具体地说,就某个民族的文化(如中国文化)而言,有人的角色更多是该文化的参与者(如毛泽东和梁漱溟),有人的角色则更多是该文化的观察者(如罗素)。在某民族文化的观察者当中,对该民族文化的同情心有很大不同;相比之下,罗素显然是对中国文化有极大同情的西方人。而在某民族文化的参与者当中,则可以根据所发挥作用之大小和方式而做出区分,比如梁漱溟虽然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参与中国文化建设,但正如他自己在1952年请人转呈毛泽东的信里所承认的,“为国事奔走多年其结果却完全落空”^⑩。

在讨论文化的时候,文化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视角区分极其重要。因为,关于文化的谈论,套用梁漱溟的说法,涉及的是“情理”,而不是“物理”;而“情理不同于物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物理存于客观,不因人而异;情理则各从乎其所处地位关系而言,自不能无异”^⑪。梁漱溟曾举例说明“殊不知话看谁说,不能离开说话的人而有一句衷合情理的话”^⑫这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譬如旧日家庭生活中,一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仰事俯畜一切引为己责,劳累而无怨;时或力不从心,有所未闻,父母且不应再责备他,子女更不应口出怨言。责怨便不合乎情理。责者非慈,怨者不孝。然而他本人若自为责怨,将更见其孝且慈焉。此即同一件事,同一句话,视乎各人所处地位而

大异其情趣。”^⑧

从梁漱溟讲的这种注重情境的理性主义(或“情理主义”,区别于“物理主义”)出发,我们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罗素的《中国问题》做相互解读的时候,两人在各自书中对中国文化的评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相关的字面表述,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它们的异同;推而广之,对中国人来说,对任何外人有关中国的评论,我们都不能简单地以其言辞是否顺耳,来判定其立场是否友好。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⑨的鲁迅请来,把他的言论作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问题》的相互解读的一个辅助文本。

鲁迅曾对罗素的中国观做过很简短但很著名的评论;人们在谈到罗素的中国之行,尤其是罗素的《中国问题》时,经常会提到鲁迅的相关评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欣赏中国人“留住了工业化国家已经丧失的一种能力”,即“享受闲暇、播撒欢笑,沐浴阳光,懂得雅致之乐、思辩之趣”的能力。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⑩针对罗素的这段话,鲁迅在1925年4月29日写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⑪1927年10月11日,鲁迅又写道,在那个“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不仅说话“激烈”是危险的,书写“可叹也夫”也不安全,“必须要如罗素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的,才行。”^⑫

鲁迅的上述观点经常被人提起,当作罗素之中国文化观在中国遭到质疑的一个例子。但鲁迅对罗素的中国观做过多次评论;仔细考察这些评论,会发现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实际上,与批评罗素的其他中国学人相比^⑬,鲁迅的批评是相当有分寸的。^⑭在“灯下漫笔”中,鲁迅

在说了中国历史无非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两种状态间循环之后,写道:“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⑮然后,鲁迅区分了到中国来说好话而不是表憎恶的外国人的几种情况,一是不知道而赞颂者;二是养尊处优而赞颂者;三是以为中国人只配照原样生活者;四是希望中国人照原样生活以增进外人游兴者。有意思的是,在鲁迅的上述分类中,罗素并没有位子;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鲁迅认为也许是“别有意思”。

那罗素的“别有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杜威在评论罗素的《中国问题》时提供了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罗素的“意思”可称为:“借他山之玉,攻自家之石”。杜威在称赞罗素《中国问题》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的同时,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包括其苏俄变种)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罗素提出“中国问题”,实质上为了讨论“西方文明的问题”^⑯;在该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⑰。

杜威的最重要中国弟子是胡适,他对罗素的“别有意思”也有过一个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罗素的“意思”可称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罗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所以他的“自己块垒”并非只限于西方;正如两卷本《罗素传》作者雷伊·蒙克所说的,对罗素来说,“中国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的问题:是文明本身能否存活的问题”。^⑱胡适在1929年用英文写的《诸文化之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从同样角度理解罗素的观点。胡适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核心是:在现代西方文明成为全世界文明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使自己顺

利地适应这种文明？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答案：抵制、全盘接受、部分采纳。他说今天已经没有人真的持抵制立场，需要讨论的只是全盘接受还是部分采纳的问题。这两种方案当中，一般人都认为“部分采纳”的方案更合理，他自己原来也主张这个方案，但后来发现，谨慎选择的态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必然影响超大数量的超级保守的人们，让老百姓离开传统立场一千步，老百姓最后可能被迫挪动才不到十步。在说明那个“部分采纳”的方案时，胡适说这个方案不仅是国内的传统辩护者的主张，也是自称是中国之友和爱中华文明者的外国作者的主张。说到这里，胡适讲了一个逸闻；他没有提罗素的名字，但显然是在说罗素对西湖轿夫的观感：“有一次，一位来游学的哲学家坐在一乘人抬滑竿，翻过一座崎岖小山，他听到轿夫中的一位唱起了一首他觉得好听的歌。他为之陶醉，并受到启发，做起了哲学思考：与其做一个怨天尤人的现代工厂工人，倒不如做一个保持辛劳中快乐吟唱之乐的中国人力驮兽。他此时担忧的，是到了中国被工业化的那天，工厂将不仅破坏所有漂亮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而且将扼杀中国苦力工作时的那种快乐精神。”^⑧把胡适这段话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1957年9月18日晚上会见印度客人时谈到罗素有关手工业的观点^⑨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其间的联系很有意思。

鲁迅自己在写《灯下漫笔》八年之后，在1933年9月写的一篇杂文中，也对罗素的“别有意思”也提供了一个解释；根据这个解释，罗素的“意思”或许可称为：“在他人之乡，说知己之话”。在一篇题为《打听印象》的杂文中，鲁迅写道：“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⑩然后鲁迅举了三个来访的外国名人：罗素、萧伯纳和瑞典的卡尔亲王。罗素到访中国，对向他打听中国印象思维的人，他回答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⑪萧伯纳到访中国，对向他打听中国印象的人，他回答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

尊重我的意见。”瑞典的卡尔亲王到访中国，对向他打听中国印象的人回答说：“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⑫鲁迅说，对罗素的回答，人们以为他滑头；对萧伯纳的回答，人们以为他刻薄；而只有对卡尔亲王的回答，人们才认为这最稳妥，是找不出什么是非来的。^⑬但鲁迅要替罗素和萧伯纳打抱不平：“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⑭鲁迅尤其想到要为罗素说一句公道话：“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预先说去了。”^⑮

在对罗素“轿夫含笑”之谈的“别有意思”的上面三种解释中，第三种解释，也就是鲁迅的解释，在我看来是最合乎罗素《中国问题》之本意的。罗素固然是到中国来找西方出路的，但罗素高于其他许多来华西方学者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对西方自家的问题有兴趣，而且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前景有关切，甚至从根本上说对整个类文明的前景有真切关怀。罗素固然对现代化与幸福感相矛盾这一点深感忧虑，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矛盾的缓解甚至解决希望；正因此他对中国的未来既持有疑虑，也抱有希望，并且还提了不少建议。罗素深知他作为外人对东道主的任何评价、对其未来的任何建议，都可能在不同人群那里得到不同的反应，于是他想尽办法，以尽可能得体的方式说出真诚想法；哪怕逆耳，也希望东道主能闻为忠言。

如果上面的解释能成立，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鲁迅是读懂罗素的——他理解了罗素的“滑头”背后的真诚和为难。鲁迅虽然说“轿夫如果能对坐轿子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⑯，但他在五年前的一篇文章就表明他知道，中国并不是没有“不含笑”的车夫的。^⑰而且，在他发表《灯下漫笔（二）》才十多天，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表明他也知道，仅仅“不含笑”是改变不了中国现状

的：“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⑩因此，他说自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闲，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⑪罗素在给朋友私信中，其实是有对中国人的尖刻抱怨的^⑫，对此鲁迅多半并不知道；但他一定知道罗素在《中国问题》中的相关批评。在该书第十二章，罗素在说了“中国人对我彬彬有礼，淳厚善良，我本应该只说好，不说坏”以后，马上就说“但为了中国好，也为了真理计，把不那么让人佩服称道的东西隐藏起来是不对的”^⑬，进而又说了“贪婪”“怯懦”和“冷漠”这三点其实相当尖锐的批评^⑭，而且还花了一点篇幅来加以说明。^⑮罗素指出的这三个缺点，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所说的“怒其不幸”“哀其不争”^⑯，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所说的“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⑰。从这里引申开去，我们也可以说，罗素的《中国问题》第十二章“中国人的品格”（“The Chinese Character”），与鲁迅多次提到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2）^⑱，有些内容是重叠的。鲁迅在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在他于那年10月19日去世前两周，写下了一段文字，值得在这里重温一下：“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按即明恩溥）的《支那人气质》（按即《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⑲

说鲁迅是读懂罗素的，说鲁迅并没有因为罗素夸西湖轿夫含笑而认定他是旧文化的卫道士、新文化的反对者，还有一个旁证：鲁迅曾经因为捍卫新文化而被“保存国粹”者与罗素绑在一起责骂过。1925年2月21日，鲁迅应《京报副刊》之邀开“青年必读书”时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句显然有特定语境的话立刻引起争议；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发表一署名文章，

讥讽“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甚至用“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这样的“传言”，来暗示鲁迅有“卖国”倾向。^⑳对此鲁迅回敬说，宋末、明末和清末发生的那些卖国事件时，“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已经行世了”。^㉑

由上所述，与中国文化的“观察者”罗素和中国文化的“参与者”梁漱溟相比，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见解，或许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对“参与者”视角和“观察者”视角的辩证综合，得益于因这种结合而带来的那种兼具冷峻与深情、理智与勇敢、自信与自省的文化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引鲁迅为知己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看法^㉒，或许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分析鲁迅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或许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下面这段话中读出更丰富的含义：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㉓

五、余论

对《中国问题》与《新民主主义论》做相互解读，重要的不是寻找两书的共同结论，而是寻找对两书之共同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更好思考。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把中国甚至世界的前景寄希望于“少年中国”（Young China）；尽管他把胡适当作“少年中国”的代表是看错了，但他那么重视“少年中国”，则是看得很准的：最后真正改变了中国，真正领导“中国人站立起来了”^㉔的那位在长沙听罗素讲课的年轻人，确实曾加入过一个叫作“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并很快参与组建了一个政党（1921年7月23日），其基础就是罗素同月稍早（1921年7月6日^㉕）无奈地认为别无选择的那个主义。中共建党以后，中国革命从

旧民主主义阶段转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大地上随即发生的那场巨变，其核心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⑥借用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赞扬鲁迅时的用词和罗素谈到中国人弱点时的用语，则是用“热忱”克服了“冷漠”，用“勇敢”克服了“怯弱”，用“忠诚”克服了“贪婪”。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的七十多年，《中国问题》中有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的预测成为现实，而当年听到《新民主主义论》末句“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⑦而深受感召者的后人们，八十年后则已经是在“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⑧的时刻，重温前辈们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了^⑨。

确切些说，在这样的时刻做的“重温”，不能不同时也是“重启”；因为，今天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比从前更意味着同时思考“世界向何处去”，比从前更需要同时思考“中国人向何处去”，比从前更需要以一种更高水平上的既自信也自省、既学习也创造、既借鉴也贡献的方式，“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致谢：本文的基础是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和2023年3月底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做的讲演；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益于同华东师范大学的应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马丽雅和上海纽约大学的潘诚男的交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梁漱溟：《旁观者清——记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481页。

②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载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增订版），《冯契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12页。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④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页。罗素此书还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1924年上海中华书馆出版的赵文统的译本，一个是1996年学林出版社的秦锐的译本。本文引文基本上引自田瑞雪的译本，除非另有专门说明。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1页。

⑥罗素：《中国问题》，第1页。

⑦罗素：《中国问题》，第1页。

⑧同上书，第286页。

⑨同上。

⑩同上书，第295页。

⑪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载《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⑫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⑬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3页。

⑭同上。

⑮同上书，第124页。

⑯同上书，第125页。

⑰同上。

⑱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6—157页。

⑲同上。

⑳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㉑Ronald W. Clark, *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 London: Jonathan Cape and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5, p. 389.

㉒“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康德和史宾诺沙以及罗素著作的译本。”参见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页。

㉓《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㉔参见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Stuart Schram(ed.), New York: The Pantheon Books, 1974, p. 239. 关于毛泽东之所以说罗素政治上有进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5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他在公众机会上谴责美国侵略行径、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支持他为国际主义与和平事业所做的努力。十一月三十日，罗素复信周恩来，表示将全心全意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0页。《周恩来年谱》还记载了1960年代初中印边境冲突期间,罗素为调停冲突致信两国领导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回函罗素以及与罗素的秘书会谈的情况,参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558页、566页。关于罗素送毛泽东的书,参见何兆武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实这是毛泽东交译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他交译的,这是后来我的老同学、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路静女士告诉我的。”参见戴燕主编:《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页。

⑤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载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551700。这个界定的另一个要素的依据是邓小平在1983年10月关于教育的题词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参见《邓小平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⑦同上书,第55页。关于冯契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哲学贡献的阐发,参见童世骏:《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⑧罗素:《中国问题》,第5页。

⑨同上。

⑩罗素:《中国问题》,第3页。

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⑫同上书,第695页。

⑬同上。

⑭罗素:《中国问题》,第6页,译文根据原文稍做修改。

⑮同上书,第5页。

⑯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⑰同上书,第345页。

⑱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7页。

⑲罗素:《中国问题》,第218页。

⑳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12月2日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jhsjk.people.cn/article/

32582303。

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参见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551700。

㉒罗素:《中国问题》,第286—287页。

㉓同上书,第218页。

㉔如周策纵说:“罗素提倡工业化,但要保存中国人被动、好和平的天性,并要保存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伦理观念,他这个看法……实际上与19世纪末中国士大夫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相似之处,而“五四”时期大多数新知识分子与杜威都不赞成这种看法。”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3页。

㉕先于罗素一年多到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评论罗素《中国问题》时的一段评语,虽然不完全确切,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作为一名职业的欧洲人,或许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欧洲的文化,以及欧洲不得不从亚洲那里学习到的东西;相反,令人吃惊和震撼的是,对世界上最古老、最浓厚和最广泛的文明的内部重构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约翰·杜威:《中国与西方——评〈中国问题〉》,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5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㉗同上。

㉘同上书,第705页。

㉙同上书,第708—709页。

㉚罗素:《中国问题》,第294页。

㉛同上书,第295页,译文根据原文有改动,参见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195。

㉜Bertrand Russell: "My 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Paul Arthur Schilpp(ed.),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 1951, p. 17。

㉝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51—654页。

㉞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11页。

㉟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1161页。

㊱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81—82页。

㊲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

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⑤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925页。

⑥⑩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926页。

⑪同上。

⑫同上。

⑬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461页。

⑭同上书,第462页。

⑮同上。

⑯同上书,第439页。

⑰同上书,第435页。

⑱同上书,第440页。

⑲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926页。

⑳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15页。

㉑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告别演讲》,载《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第303页。关于罗素在华演讲引起的中国知识界的讨论,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见马丽雅:《中国道路的西方视角——20世纪西方思想家的中国观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三章,第144—221页。

㉒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㉓“吾书题名《中国——理性之国》,盖本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理性的一些言论而来”;“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之云,固非达于社会主义之实现不足言也。”参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63页。

㉔同上书,第276页。

㉕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440—441页。

㉖同上书,第439页。

㉗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87页。

㉘同上书,第688页。

㉙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74页。

㉚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78页。

㉛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58页。

㉜同上。

㉝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58页。

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㉟罗素:《中国问题》,第227—228页。

㊱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㊲鲁迅:《谈“激烈”》,载《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㊳参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3页。

㊴参见彭姗姗:《“中国问题”的缘起、实质与心理根源——罗素在北京的生活与思想》,载《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1期。

㊵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26页。

㊶约翰·杜威:《中国与西方——评〈中国问题〉》,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5卷),第180页。

㊷同上书,第181页。

㊸Ray Monk, Bertrand Russell: The Ghost of Madness, 1921—1970, New York & 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0, p. 16.

㊹Hu Shih(胡适),“Conflict of Cultures”,载《中国基督教年鉴》(第1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胡适其实是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唯一点名赞扬的当代中国人(参见《中国问题》,第293—294页),尽管胡适曾对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来华演讲非常抵触(参见1921年年初胡适给陈独秀的信,参见胡适:《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尽管罗素刚走不久,胡适就在1921年7月16日写了一首题为《哲学家》的诗,抱怨“他(即罗素)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参见《胡适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但1926年10月17日,当时正在伦敦的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去拜访罗素了,罗素告诉他,苏俄的专政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并且在听了胡适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以后,回答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㊻鲁迅:《打听印象》,载《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㊼同上。

㊽同上。

㊾鲁迅:《打听印象》,载《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㊿同上。

㊱同上。要理解鲁迅在1933年对罗素的“滑头”的这种

解释,他在1923年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罗素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参考。这篇文章的起因是鲁迅翻译了俄国盲人艺术家爱罗先珂的一篇北大和燕京女校演剧的观后记文,其中有对于演剧学生的批评;一个叫魏建功的当时北大学生写题为“不敢盲从”的文章表达不满,其中也隐含对鲁迅的指责。鲁迅于是写了几句“声明”予以反驳,说自己虽明知爱罗先珂此文在中国是会引起不满的,但却没有阻止的勇气,反倒佩服爱罗先珂会说出他(鲁迅)自己已经不愿意发表的“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然后鲁迅写道:“然而这也就是俄国人和中国以及别国人不同的地方,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其实是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的故事,我也曾经和他谈过的。”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载《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⑩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⑪鲁迅写道:民国六年的冬天,“我”坐着一辆人力车上,车夫拉车跑在路上时,车把不小心带倒了一个老妇,车夫立即停下来,“我”认为他多事;看着“毫不理会”“我”的车夫搀着老妇去巡警分驻所,“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参见鲁迅:《一件小事》,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82页。

⑫鲁迅:《杂忆》,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⑬同上书,第238页。

⑭见陈晓月:《赵元任日记中的罗素访华事件(1920—1921)》,载《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11期,第42页。

⑮罗素:《中国问题》,第237页。

⑯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本,第165页;参见田瑞雪译本,第237页。在说出这三个弱点之前,罗素做了好几点说明:第一,任何民族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第二,中国人是他见到的最好的民族;第三,中国人的缺点都比西方人的缺点要好:中国人的缺点就像艺术家的缺点一样,只害他自己而不害别人,而西方人的缺点是要害别人的;第四,考虑到对他人的影响,西方不仅其缺点比中国的缺点更坏(比如崇武好战),而且其优点(比方崇尚效率和进步)也因为对别国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大打折扣。在说出那三个弱点以后,罗素又写道:“奇怪的是,问我这话的人非但没有生气,还认为我批评得很公道,接着又和我讨论了可能的补救办法。他这种思想上的诚实恳挚是中国多种至善美德的明证。”见《中国问题》,第237页。据梁漱溟,罗素说的“问我这话的人”可能是梁启超(这猜测应该是对的,因为据记载,1921年7月7日,梁启超、丁文江

等设宴为罗素践行,参见《罗素来华形成及讲演总表》,载《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第309页),而梁漱溟本人对罗素之批评的态度,或许也会被罗素作为“中国多种至善美德的明证”:“罗素对于中国人亦非只有称美而不加指责。……其言未必正确,未必无遗漏,但见其如古人所云‘好而知其恶’耳。”梁漱溟:《中国——理性主义》,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05页。

⑰罗素:《中国问题》,第237页。

⑱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82页。

⑲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⑳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㉑鲁迅:《立此存照(三)》,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9页。

㉒柯伯森:《偏见的经验》,载《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61页。

㉓鲁迅:《聊答“……”》,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258页。

㉔毛泽东在1956年、1957年的多次谈话中提到鲁迅,赞扬“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说“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说“鲁迅后期的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尤其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第83页、第263页、第277页、第253页。

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㉖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页。

㉗罗素于1921年7月6日于北京在教育部会场作告别演讲,参见《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第309页。

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9页。

㉚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㉛参见童世骏:《序一: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载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第i页。